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家庭消费的 微观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分析

郭小琳¹ 陈 帅² 赵宗胤² 钱文荣²

(1.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2.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推进城市吸纳农民工落户, 通过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为其生活质量改善创造条件, 对社会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证研究发现: 城乡融合背景下, 以户籍政策开放推动的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显著提升了落户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支出; 机制分析表明, 身份认同增强、家庭收入增加和收支不确定性减少是家庭消费增加的重要机制, 身份认同中的距离效应得到进一步验证, 落户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水平随邻近地理距离的减少而产生更大的趋同性; 异质性分析发现, 老一代农民工相较于新一代农民工、县级市相较于市辖区的家庭消费增加更加明显, 收入和资产差距较小的区县家庭消费支出增加更为显著。未来, 抑制县域内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增强农民工市民化后的身份认同, 对更好衔接扩大内需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农民工市民化; 城乡融合; 家庭消费; 身份认同

一、引 言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切入点, 对城乡间人口等要素的均衡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城乡融合背景下, 城市层面接纳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开放力度、落实情况以及与农民工落户需求的契合程度, 直接决定了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速度与质量^[1-2]。回顾已有文献, 以往对农民工群体市民化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层面^[3-5]。但中国的市是一个行政单位, 区县之间的市民化政策和进程往往有很大差异, 而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 县域内农民工的就业半径

[收稿日期] 2024-06-1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5-01-18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2141307);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SCJJ23MGC12);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SCJJ24ZD38); 西南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博士服务站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1. 郭小琳(<https://orcid.org/0000-0003-1070-2121>), 女,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农民工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和城乡社区治理相关研究; 2. 陈帅(<https://orcid.org/0000-0002-2310-6743>), 男,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相关研究; 3. 赵宗胤(<https://orcid.org/0009-0003-0263-6707>), 男,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土地问题和农业转移人口相关研究; 4. 钱文荣(<https://orcid.org/0000-0002-4556-9300>) (通信作者), 男,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土地问题等相关研究。

不仅从乡镇延伸到县域,更是延伸到了市辖区^[6]。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定义农民工流入地,不仅应当包含县和县级市,也应该包括地级市的市辖区等县级行政单位^[7]。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是通过户籍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推动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内容的农民工市民化^[8]。作为城市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是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关切者,其在县域内的市民化水平深刻影响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国家内需潜力的扩大^[9]。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强调,要着力挖掘内需潜力,特别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内需潜能。

在县域城乡融合的推进过程中,由于户籍身份和不完全的社会保障等因素,农民工群体相对于城市本地居民往往储蓄更多,消费更少。一部分文献通过直接比较城市中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的消费差异,来推断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家庭消费可能带来的影响^[10-11]。也有文献在流动人口内部寻找对照组,细化市民化群体的可比对象,以此来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消费水平变化^[12-13]。尽管一些研究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或市民化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但直接分析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家庭消费影响的文献较少,对这一问题的微观机制分析也还有一定的开展空间。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缺少长跨度、跟踪的微观调查数据,现有研究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分析多采用省级层面数据或者截面数据,时间跨度较短,且无法控制家庭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特质,限制了家庭异质性讨论的开展和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另一方面,目前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后续影响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可观测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这一方法虽然优于直接比较,但并不能解决潜在的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且难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微观机制讨论。

本文利用包含2011—2017年4轮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中国家庭大数据库,分析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落户农民工家庭消费影响的微观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边际贡献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现有城市层面户籍指数测算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手动整理了县域户籍制度改革文本数据,首次构建了2011—2017年区县层面的户籍开放指数,为定量衡量县域户籍制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基础数据。第二,本文使用县域户籍开放指数作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工具变量,将户籍制度这一正式制度直接定量纳入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分析了县域户籍制度改革引致的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落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丰富了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家庭消费的相关研究^[14-16]。第三,本文以县域为观察视角,为理解城乡融合背景下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城乡身份融合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其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支撑,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17]。

二、研究综述与假说

家庭消费是家庭的基本功能之一。新迁移经济学关注家庭在个体迁移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受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影响,且又会影响家庭行为^[18],迁移的目的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19],也蕴含着最小化家庭风险的目标^[20]。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决策受其家庭影响;另一方面,市民化决策又会对其家庭消费存在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上述影响的基础上,对其微观机制展开进一步讨论。

(一)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直接影响

在当前严格限制城市居民到农村落户的背景下,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农民工流入城市落户基本归属于文献中永久迁移的讨论范畴。在有关国际移民的研究中,已有文献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临时工作签证的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动态随机理论模型,发现非法移民与有临时工作签证移民的储

蓄率会随着居留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少^[22]。也有研究使用加拿大所得税系统的面板数据,发现国际移民在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后的十年里,收入相较于本国居民上升明显^[23]。在关于国内移民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市民身份变动对个体和家庭产生影响的结论^[11,24]。有学者使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借助方言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分析了市民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25]。根据相对收入假说,在城镇化进程中完成市民化的农民工,如果相对收入发生变化,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也将发生变化,但对平均消费倾向不会具有明显的影响。本文由此提出研究假说1:

H1: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升家庭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家庭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但不会改变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

(二)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家庭消费的微观机制

个体为何拥有身份并据此划分群体以及不同身份的个体如何组成身份相同的群体是身份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问题^①。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要制度性来源,基本可以回答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对于个体如何组成身份相同的群体,已有文献表明,内群体偏袒和外群体疏离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群体的认同,并解释不同身份群体间的趋同和排斥现象^[26]。家庭消费作为家庭重要的资源配置活动,能够外在显示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27],不同群体的消费方式又可以互为参考,使得家庭可以模仿其他处于更高地位的群体来摆脱本群体的消费特征^[28,29]。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最直接的转变就是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非本地户籍身份转为本地户籍身份。经历了市民化身份转变的农民工有可能通过对城市户籍居民的消费认同来改变家庭消费。从直接效应来看,传统经济学认为,每个人的偏好都是外生给定的,与社会环境无关。而当“身份”这一概念被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时,社会环境被视作能够影响偏好的变量,并会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30]。已有研究表明,身份认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群体的工作选择^[31],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融入状态也会因身份认同效应而有所差异^[32-33],进而可能影响家庭消费。在身份认同效应存在的情况下,邻近地理范围内其他群体的消费水平对落户农民工强化身份认同和减少社会距离的影响更大,因而相较于更大的地理距离,邻近地理距离范围内群体的身份认同效应也可能更大^[34-35]。因此,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有可能使农民工群体获得所在地城市户籍而产生直接的身份认同效应,进而增加家庭消费。

从间接效应来看,根据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家庭收入的变动会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城镇化进程中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可能由于户籍歧视消除或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提升而获得更加稳定的收入^[36-38]。本文在假设1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县域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是否会导致这一群体收入增长,而后分析收入增长是否主要来源于更加稳定的工资性收入提升。

鉴于新迁移经济理论认为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是家庭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21],本文提出,从预期效应来看,风险和不确定性变动会影响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实践中,在2016年及之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中,除部分城市允许在城镇失业且在农村有宅基地的农民工可申请迁回农村外,大部分城市都严控城镇人口向农村地区迁移。因而,农民工市民化实际上表征了其在城镇长期稳定居留的意愿。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原本因为城乡“两栖”生活带来的收入波动也会减少^[39-41]。作为永久迁移选择的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至少可以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收入稳定性增强,一个是支出不确定性减少。当面临收支不确定性时,家庭的消费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不确定性水平增高,家庭消费可能会下降;不确定水平降低,家庭消费可能会增加。从家庭收入不确定性降低的角度来看,农业收入被认为是不确定性较大的收入来源,

① 参见张弘《社会身份、异质群体与合作的演化——基于演化理论与计算方法的身份经济学研究》,浙江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市民化后的农民工群体可能会减少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更加稳定地参与非农就业,由此增加工资性收入。城镇社会保险被认为比农村社会保险保障水平更高^[42],从支出不确定性降低的角度看,家庭良好的社会保障状况会降低支出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其家庭消费。综合来说,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2(见图1):

H2: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预期效应三条途径作用于家庭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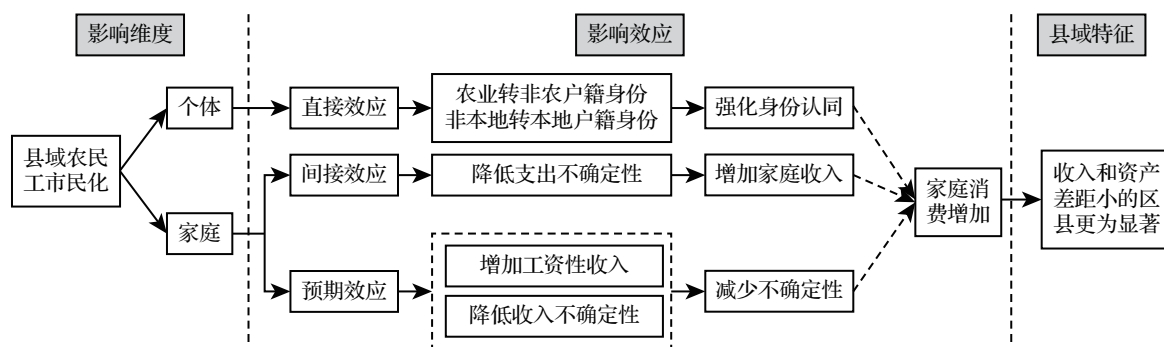


图1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家庭消费的机制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基于研究综述与研究假说,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基准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Consumption_{ijt} = \beta_0 + \beta_1 hktype_{ijt} + \phi' X_{it} + \gamm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式中 $Consumption_{ijt}$ 代表区县 j 的家庭 i 在第 t 年的家庭消费变量,包含家庭消费支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hktype_{ijt}$ 表示调查对象上一年户主的户口类型,本区县非农户口则 $hktype_{ijt} = 1$, 否则 $hktype_{ijt} = 0$,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可以通过自变量跨年份的变化来观察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的市民化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既包含农民工在流入地落户,也包含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多维度嵌入^[43-44],但城市层面的户籍政策开放力度与农民工落户需求的契合程度,直接决定了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速度与质量^[2]。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结果中,仅使用农民工落户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代理变量,在微观机制讨论中,本文分析了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身份市民化与其他收入、保障等方面的潜在关系。系数 β_1 表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为本文关注的核心参数。 γ_i 和 δ_t 分别代表家庭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β_0 为常数项,标准误聚类到区县层面。 X_{it} 表示其他随时间变动且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和家庭消费有关的变量。

为了识别 H1 中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因果影响,借鉴已有文献工具变量的设定思路^[20],本文收集构建了 2010—2018 年全国分年度 2 864 个区县的户籍开放指数,将其作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第一,由户籍政策文本提取测算的户籍开放指数是区县层面的变量,且主要受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的高位推动,区县层面的户籍政策与家户层面的市民化决策和家庭消费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较低;第二,区县层面户籍开放指数唯一可能作用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进而影响家庭消费的渠道,是通过影响县域农民工群体的落户难度而满足唯一性和排他性。同时,由于县级行政区划在本研究的时间跨度内存在一定调整,本文以 2010 年 2 864 个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期进行计数,后期涉及的撤县设区等内容变化也在此基础上作出了相应调整。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hktype_{ij,t} = \alpha + \beta_2 Openness_{jt} + \phi' X_{it} + \gamm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j,t}$$

(2)

式中 $Openness_{jt}$ 为区县层面的县域户籍开放指数,系数 β_2 表示在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区县户籍开放指数对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X_{it} 与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控制变量一致, α 为常数项,其他变量与式(1)相同,不赘述,标准误聚类到区县层面。

为了验证 H2 中的直接效应,本文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层级上的本外地户籍消费支出差异,构建省份、城市、区县和社区维度的消费支出差异数据,设置如下估计模型:

$$Consumption_{it} = \beta_0 + \beta_1 hktype_{it} + \beta_2 hktype_{it} \times Gap_{Consump_{ct}} + Gap_Consump_{ct} + \phi' X_{it} + \gamm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ct}$$

(3)

式中 $Gap_Consump_{ct}$ 主要衡量方式为分别取省份、城市、区县和社区层面本外地户籍身份群体间的消费支出差异。交乘项系数 β_2 为本式关注的核心参数,如果该参数正向显著,则说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了群体间的消费支出差异。

间接效应和预期效应的设定方式为:

$$y_{it} = \beta_0 + \beta_1 hktype_{it} + \phi' X_{it} + \gamm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4)

式中 y_{it} 代表在第 t 期、家庭 i 的收入变量,检验间接效应。系数 β_1 表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该系数如果正向显著,则说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家庭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为了检验预期效应,用 y_{it} 代表预期效应中的收支不确定性。参考已有文献^[45-46],当指代收入不确定性时,本文使用收入方程残差项的二分变量,残差值越小,收入不确定性越小,即 0 是低收入不确定性,1 是高收入不确定性;当指代支出不确定性时,本文采用家庭城镇保险参与情况作为支出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其他变量定义与式(1)相同。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参照已有文献^[47-48],根据历年相关变量可得性,选取了户主性别、年龄及其平方、婚姻状态、是否有跨市务工经历、受教育程度等户主特征变量,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不健康成员占比、16 岁以下家庭成员人数、家庭现住地、是否有自有住房和家庭净资产等家庭特征变量。

(二)数据介绍与县域户籍开放指数测算

本文的微观家庭数据来源于浙江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中的中国家庭大调查数据。由于区县层面的地理信息指标申请权限,本文的年份范围是 2011—2017 年。本文调查地点为城市,将分析对象限定于在城市工作且至少在调查初始期为农业户口的群体。通过调查对象对“目前您的户口类型是农业、非农业还是统一为居民户口”“您现在的户口所在地是否为本县”“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时间是哪一年”三个问题的回答,本文得到了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状态。此外,由于本文主要针对农民工在县域达到一定标准后满足落户条件而落户的情况,根据主要研究内容和参考已有文献^[12],去除因为“土地被征用”“建制改变,例如村转居、乡改镇和城市边界扩张”“读书”和“参军”这四类并非完全因为流入地户籍政策放宽而实现市民化转变的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统计与描述 (n=27 058)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说明
<i>Consump</i>	9.195	0.796	5.779	13.038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加 1,取对数
<i>APC</i>	0.679	0.274	0.001	1	平均消费倾向(家庭消费总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i>MPC</i>	0.490	0.428	0	1	边际消费倾向(当期相较上一期家庭消费总支出变动占家庭总收入变动比重)

续表1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说明
<i>hukou</i>	0.064	0.244	0	1	户主是否有所在地城市户口;家庭成员落户的比例(<i>hukou_2</i>)
<i>hkindex</i>	0.217	0.173	0	0.716	县域户籍开放指数
<i>gender</i>	0.771	0.420	0	1	1=户主是男性,0=户主是女性
<i>age</i>	51.785	14.369	16	113	户主年龄
<i>age²</i>	28.882	15.383	2.56	127.69	户主年龄的平方除以100
<i>marriage</i>	0.843	0.364	0	1	1=户主已婚,0=户主未婚
<i>edu</i>	2.950	0.908	1	4	1=未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含中专/职高)及以上
<i>mig</i>	0.079	0.271	0	1	1=户主有外出务工经历,0=户主无外出务工经历
<i>pop</i>	3.554	1.615	1	20	家庭总人口数
<i>labor</i>	2.513	1.364	0	12	家庭16—64岁(含本数)人数
<i>middle_ratio</i>	0.602	0.324	0	1	初中学历以上家庭成员占家庭总人口数比例
<i>unhealth_ratio</i>	0.116	0.234	0	1	健康状况为不健康或非常不健康人数占家庭总人口比例
<i>young</i>	0.574	0.782	0	8	家庭16岁(不含本数)以下人数
<i>house</i>	0.808	0.394	0	1	1=家庭现住地有自有住房,0=家庭现住地没有自有住房
<i>asset</i>	12.395	2.426	0	16.012	上一年家庭净资产加1,取对数
<i>pgdp</i>	10.603	0.693	8.651	12.23	人均GDP取对数
<i>spop</i>	4.235	0.576	1.808	5.193	总人口取对数
<i>secgdp</i>	0.451	0.150	0.062	0.833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
<i>tergdp</i>	0.433	0.177	0.131	0.936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i>wage</i>	10.544	0.496	9.811	11.925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取对数
<i>income</i>	10.864	0.885	5.953	15.295	家庭总收入取对数
<i>wageinc</i>	5.509	5.301	0	13.353	家庭工资性收入加1,取对数
<i>busiinc</i>	1.739	3.980	0	15.524	家庭工商业收入加1,取对数
<i>insu</i>	0.507	0.500	0	1	是否参与城市社保
<i>identity</i>	4.435	2.672	1	10	除样本家庭外县域内城乡户籍消费支出差值的十分位数。省内(<i>identity_prov</i>),城市内(<i>identity_city</i>),社区内(<i>identity_commu</i>)

注:连续变量均进行了1%的缩尾,上述描述性统计均基于缩尾后数据整理;除计算边际消费倾向时使用不同年份差值导致样本减少外,其他变量样本数均为27 058。

本文计算县域户籍开放指数的原始文本来源于北大法宝、法律之星以及各省市政府和公安部门的相关文件。通过在上述数据库中检索“户籍制度改革”“户籍迁入登记”“户口迁移”“户口管理”“落户”“非户籍人口”等关键词,排除没有明确细则的相关文档,文章共获取了2009—2018年各区县仍在有效时效区间内的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等户籍制度改革文本资料共计1 830份。西南财经大学户籍改革与移民研究项目团队于2021年公开了120个主要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原始文件数据库^[4]。为了验证区县层面基础数据的完整性,本文第一步将区县户籍制度改革统计数据压缩到地级市层面,与该数据库进行交叉比较。原始文件数目统计与比较信息如表2所示。从研究的城市数量上来看,本文文件数约为已发布数据库数值的2—3倍,但并不是完全的倍数关系。主要原因是已发布数据库虽然只涉及120个主要城市,但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2016年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已经基本放开,因而全国范围的政策文件数尽管在2014年之前是已发布文件的2—3倍,但在2015年和2016年差值明显减少。第二步,本文根据户籍制度改革相关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颁布特征,在原始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中,对于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

度改革的通知》和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样本期内国家层面颁布了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但区县层面两年内未有政策跟进的,我们通过向当地公安机关电话访问和对地方派出所现场走访的方式进行了补充询问。实际上,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除了特大城市主城区,地方政府均有较为明显的放开放宽落户政策的动力^[49]。第三步,根据地方制定户籍改革文件中分条目信息连续的特点,交叉对比同一个区县不同年份的分项目政策变动,以补充完整文件信息。总体来看,本文基础数据总体完整可靠。

表2 户籍制度改革基础文本统计与比较

比较信息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当年值										
本文	97	86	92	82	107	103	195	146	140	87
张吉鹏和卢冲	33	41	40	43	36	41	144	94	—	—
累计值										
本文	792	878	970	1 052	1 159	1 262	1 457	1 603	1 743	1 830
张吉鹏和卢冲	253	294	334	377	413	454	598	692	—	—

注：部分数据参考张吉鹏、卢冲《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4期，第1509-1530页。

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文件的原始文本中,包含对购房(含租赁)、就业、引进人才、直系亲属投靠等多方面落户具体申报条件的详细要求。层次分析法是确定指数构建中指标权重的分析方法,根据不同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两两比较后通过判断矩阵判断一致性,最后标准化为各个指标的具体权重。参考已有文献^[50-51],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来测算区县层面的户籍指数。具体步骤如下:第一,在梳理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借助词频统计和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文件的原始分类,对全国区县层面的户籍政策文本进行关键指标提炼,得出研究区间内的购房、技能、经商、就业和租房五大类一级指标。第二,通过正则表达式提取户籍政策文本包含的改革力度数据,分项归类为“购房价值”“社保年限”等16个二级指标(具体条目如图2所示)。在指标的具体测算方面,例如2015年青岛市发布的《青岛市公安局关于贯彻执行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规定“购买单套新建商品住宅建筑面积达到100平方米以上,取得房地产权证的具有完全房屋产权资格的人员,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成年未婚子女可在购房地申请落户”。本文提取政策文件中对购房落户住房面积的要求作为实际研究中指标的具体数值,匹配CEIC(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 Center)经济数据库中的区县平均商品房房价数据测算购房价值。第三,在权重设定中,权重越高代表该分项越能体现户籍开放,参考城市户籍开放度测算过程中的权重设定排序^[50],本文将租房即可落户视为最能体现户籍开放的落户分类,定义为最高权重,就业落户次之,而后是经商落户,需要技能偏向和购房才能落户的权重赋值最低。最后,通过层次分析法测算区县户籍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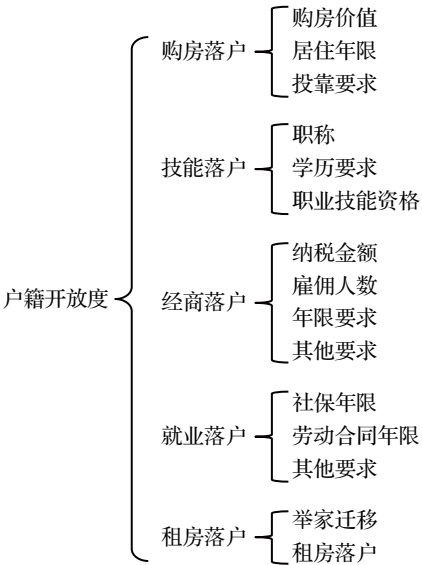


图2 户籍开放指数的指标设定

图3给出了本文计算的不同年份区县层面县域户籍开放指数的核密度曲线,可以清晰地看出两点:第一,2010—2018年,县域户籍开放指数的核密度曲线整体逐渐右移,这表明县域户籍制度

改革明显呈现整体放宽的趋势;第二,核密度曲线的平滑程度随年份推移逐渐增大,且根据城市规模大小形成了多峰值状态,这一结果与政策背景一致,表明不同城市间的户籍开放差异随政策要求有所降低。图4是自变量农民工市民化和工具变量县域户籍开放指数的相关关系图,这一结果也显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为了验证我们所使用的区县户籍指数的合理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分析:第一,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在相同的原始文本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张吉鹏和卢冲^[4]使用的投影追踪模型构建了另一个区县户籍指数,并与正文使用的层次分析法构建的户籍指数相比较,发现结果基本一致。第二,我们将本文构建的区县层面户籍指数加权平均到地级市层面,计算出了全国省会城市市辖区和县级市的户籍开放指数,其排序与已公开数据基本一致,可供对县域城镇化感兴趣的相关学者使用和参考^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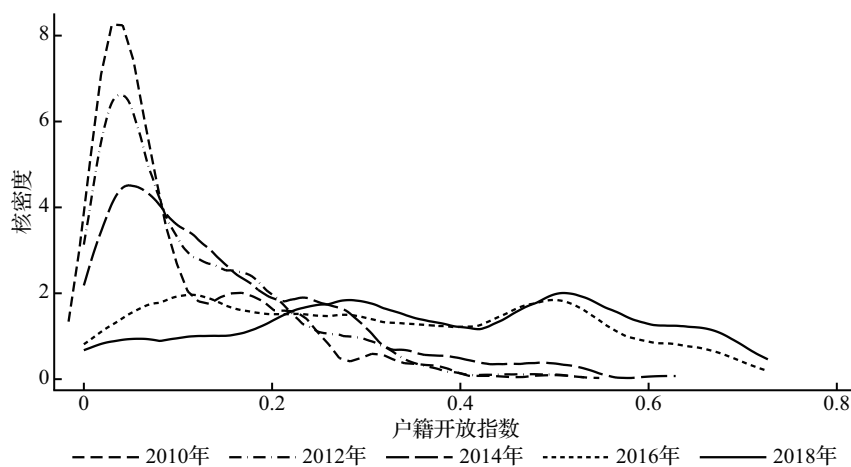


图3 2010—2018年县域户籍开放指数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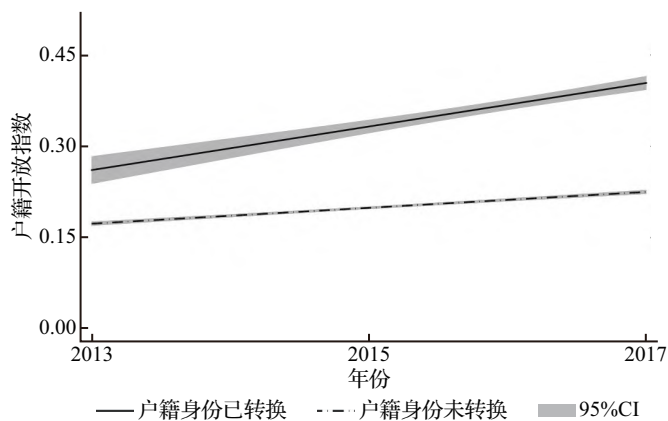


图4 县域户籍开放指数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关系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结果

基本估计结果发现,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其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表3列(3)是使用固定效应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使用工具变量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家庭

① 限于篇幅未在文中展示,留存备案。

人均消费水平提高 25.8%。比较国际移民的研究数据,已有研究使用合法居留身份特赦份额作为非法移民合法身份获得的工具变量,得到非法移民相对于合法居留者消费水平低 40% 的结论^[52]。由于近年来户籍政策放开,城市户籍身份获得的困难程度明显低于国际移民中合法身份的获得,所以根据上述文献的结果比对,本文的估计结果基本合理。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 F 值为 132.326,远高于弱工具变量临界值 10 的要求。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区县户籍开放程度越高,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比例也越高,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明显。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县域户籍开放指数变动一个标准差对农民工是否实现市民化的影响,发现县域户籍开放指数每变动一个标准差,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概率将提升约 0.61 ($1.025 \times 0.145 / 0.244 = 0.609$)。这一结果说明,样本区间内,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水平高度相关。从表 4 开始,本文仅汇报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和第一阶段 F 值。

表 3 列(4)和列(5)分别报告了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回归结果和理论分析一致,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并不会对家庭平均消费倾向产生明显影响,但显著提升了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假说 H1 得到验证。

表 3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

变量	<i>Consump</i>	<i>Consump</i>	<i>Consump</i>	<i>APC</i>	<i>MPC</i>
	(1)	(2)	(3)	(4)	(5)
<i>hukou</i>	0.140*** (0.016)	0.063*** (0.015)	0.258** (0.118)	0.037 (0.053)	0.263* (0.139)
工具变量(<i>hkindex</i>)			1.025*** (0.089)	1.025*** (0.089)	1.025*** (0.089)
第一阶段 F 值			132.326	132.326	66.4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7 058	27 058	27 058	27 058	10 499
Centered R^2	0.328	0.732	0.063	0.018	0.007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区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列(1)和列(2)汇报的 R^2 为原值,列(3)—列(5)汇报的 R^2 为中心化的 R^2 。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本回归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改变关键变量设定方式(替换总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替换“家庭成员中落户所在地城市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替换工具变量(使用投影追踪模型计算的县域户籍开放指数)和改变样本(去除北上广深)等方式来检验,发现估计系数方向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第一,更改被解释变量的设定方式,消费按照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定义来进行测算并取对数。表 4 列(1)结果显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会使家庭总消费增加 26.1%,与基础回归估计中 25.8% 的基本回归结果相差不大。

第二,更改核心解释变量的设定方式。虽然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户主是否落户城市”,但是对于家庭来说,如果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消费的微观机制成立,家庭中非户主身份的其他成员在所在地市民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消费。微观影响机制分析中,连续变量交乘难以分析其影响结果,所以本文主回归中仍使用户主市民化信息作为代理变量。表 4 列(2)稳健性检验中使

用农民工家庭成员落户比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显示,家庭成员市民化比例增加对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与正文以“户主”测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第三,更改工具变量的衡量方式。为了避免指数测算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偏差,本文进一步采用了客观权重赋值的投影追踪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4]。表4列(3)估计结果显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使得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提高了31.2%。正文中的基准估计结果略低于使用投影追踪模型测算的户籍开放指数,可能的原因是减少了投影追踪模型中因不同落户项目的不合理分组带来的信息冗余,得到了更为明确且具有经济学含义的统计指标^[50]。

第四,去除北上广深的样本。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落户开放政策具有特殊性,亦极可能为本文中的极端值。本文通过去除上述城市,改变样本范围,重新估计了回归结果,如表4列(4)所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仍与基准回归较为一致,但影响系数有所增加,特别是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人均消费的影响程度从增加25.8%变为增加36.7%。这说明在剔除了一线城市后,也就是剔除了户籍制度改革程度明显更低的极端值之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提升家庭消费的效应不仅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明显。

至此,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家庭消费的存在性和稳健性得到比较完整的验证。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i>Consump_total</i>	<i>Consump</i>	<i>Consump</i>	<i>Consump</i>
	改变被解释变量设定	改变解释变量设定	变换工具变量衡量方式	改变样本
	(1)	(2)	(3)	(4)
<i>hukou</i>	0.261** (0.121)		0.312** (0.155)	0.367* (0.189)
<i>hukou_1</i>		0.279** (0.1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第一阶段F值	132.326	132.326	149.262	123.747
观测值	27 058	27 058	27 058	27 058
Centered R^2	0.047	0.069	0.068	0.071

(三)异质性分析

中国的市是一个行政单位,城市内部主要分为市辖区和县域两类县级行政单位。本文在基本回归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分析,探讨地区特征和家庭特征差异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进一步通过归纳不同区县社会环境差异,来为微观机制讨论的结果提供基本证据。

表5结果显示,在县级市落户的农民工人均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市辖区,并且老一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家庭消费提升更为明显。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农民工返乡的主要目的地是老家的县城^[22],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可能会将外出务工阶段积累的收入和财富等带往定居地,因而,县级市可能由于更低的生活成本使得市民化群体实现更高的消费。第二,在县级市范围内,收入和资产差距在不同群体间相差不大,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后,县级市的农民工群体通过储蓄来增加资产和应对未来风险波动的可能性小于市辖区^[53],这一行为导致在县级市市民化带来的消费增加作用更大。

表6在已有区县特征差异结果的基础上,重点从社会网络、户籍收入差距和户籍资产差距这三个方面分析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在家庭特征和区县特征差异方面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列(1)和

列(2)使用家庭红白喜事等礼金支出的二分位数作为社会网络大小的衡量变量^[54]。结果表明,在农民工落户地,社会网络较大的家庭,消费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社会网络较小的家庭消费提升作用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县域社会圈子狭小,在传统熟人文化的影响下,社会网络较大的家庭可能通过更多的社会互动提升在当地的融入感,消费提升效应也越明显^[28]。

表5 区县和家庭异质性分析

变量	Consump			
	县级行政区划层级		年龄差异	
	市辖区	县级市	新生代	老一代
	(1)	(2)	(3)	(4)
<i>hukou</i>	0.236** (0.119)	0.308* (0.175)	-0.179 (0.423)	0.271*** (0.090)
第一阶段 <i>F</i> 值	77.997	58.791	24.58	115.385
组间差异显著性(<i>p</i> 值)	0.009		—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6 513	10 545	3 134	22 534
Centered <i>R</i> ²	0.069	0.062	0.158	0.052

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使用似不相关检验。

相对收入假说理论也认为,个体的消费水平不仅受其自身收入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其相对于其他人收入水平的影响。在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消费支出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和财富分化也影响着消费分层现象的发生^[29]。通过表6列(3)和列(4)的比较可以看出,收入差距扩大,明显不利于发挥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对市民化群体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列(5)和列(6)进一步分析了户籍资产差距大小对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30],可以看出,区县范围内户籍资产差距越大,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

表6 社会环境异质性分析

变量	Consump					
	社会网络小	社会网络大	收入差距小	收入差距大	资产差距小	资产差距大
	(1)	(2)	(3)	(4)	(5)	(6)
<i>hukou</i>	0.172 (0.169)	0.461** (0.181)	0.579*** (0.210)	0.187*** (0.041)	0.538*** (0.204)	0.197*** (0.037)
第一阶段 <i>F</i> 值	84.303	70.593	72.576	57.634	79.029	73.876
组间系数差异(<i>p</i> 值)	—		0.000		0.0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4 647	12 411	17 834	9 224	17 504	9 554
Centered <i>R</i> ²	0.078	0.031	0.077	0.074	0.057	0.075

五、微观机制讨论

县域农民工市民化通过何种潜在机制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是理解新型城镇化助推扩大内需

战略的重要问题。本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继续使用工具变量法,检验假说H2中的微观机制。如果本文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引致家庭消费增加的直接效应存在,市民化群体受其邻近地区周边群体消费的带动作用应该更大^[55]。表7列(1)—列(4)分别使用了县域内、省内、市内和社区内部的城乡户籍身份差值的十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市民化群体的身份认同效应设定的邻近范围越小,周边群体的消费示范作用越强,市民化群体身份认同效应带来的消费增加越明显。

表7 直接效应

变量	Consump			
	(1)	(2)	(3)	(4)
<i>hukou</i> × <i>identity</i>	0.008*** (0.003)			
<i>identity</i>	0.004 (0.005)			
<i>hukou</i> × <i>identity_prov</i>		0.011*** (0.003)		
<i>identity_prov</i>		−0.003 (0.005)		
<i>hukou</i> × <i>identity_city</i>			0.018*** (0.004)	
<i>identity_city</i>			−0.011** (0.004)	
<i>identity_community</i>				0.019*** (0.003)
<i>hukou</i> × <i>identity_community</i>				−0.012*** (0.003)
<i>hukou</i>	−0.038* (0.019)	−0.056** (0.023)	−0.098*** (0.024)	−0.096*** (0.0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第一阶段F值	132.326	132.326	132.326	132.326
观测值	27 058	27 058	27 058	27 058
Centered R^2	0.073	0.073	0.074	0.074

本文进一步分析在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家庭是否存在间接的收入增长机制,收入增长会对市民化后的农民工家庭消费产生何种影响。表8列(1)结果显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家庭总收入大致增加17%,这一结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列(2)和列(3)进一步观察了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引致家庭总收入增加的来源类型。结果表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增加了其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水平,但对家庭的工商业收入无论在数值上还是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明显影响。

收入与风险抵御能力和消费具有重要关联,在上述收入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收支不确定性带来的预期效应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列(4)结果显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会显著降低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水平。对农民工群体而言,面对收入不确定性,农民工家庭可能会增加储蓄来缓冲可能的相对收入波动^[56]。

面对支出不确定性,农民工群体可能会降低消费支出,以应对可能的支出风险。相较于农村居民享有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农民工群体市民化后转为城市保险使其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因而本文着重分析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社保城乡变化对农民工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住房公积金也是保障性福利,但拥有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的农民工占比较低,本文未将其纳入分析。列(5)结果显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社会保险类型转变的交乘项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合其他两项系数,说明作为风险保障手段的城市社会保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工群体敢于消费,提升落户后农民工家庭的整体消费水平。假说H2得以证明。

表8 间接效应与预期效应

变量	间接效应			预期效应	
	ln(家庭总收入)	ln(家庭工资性收入)	ln(家庭工商业收入)	收入不确定性	城市社会保险类型转变
	(1)	(2)	(3)	(4)	(5)
<i>hukou</i>	0.167* (0.087)	0.101** (0.043)	0.037 (0.103)	-0.306*** (0.119)	0.046*** (0.010)
第一阶段F值			132.32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7 058	27 058	27 058	27 058	27 058
Centered R ²	0.037	0.029	0.010	0.019	0.012

注：收入不确定性使用的代理变量为收入方程残差项的二分变量,0表示低收入不确定性,1表示高收入不确定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理解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家庭消费的微观机制,对衔接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县域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增加了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为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使用县域户籍开放指数作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的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收入和资产差距小的地区,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后家庭消费支出增加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身份认同效应带来的家庭消费同化是农民工市民化后消费支出增加的直接原因,此外,收入增加和收支不确定性降低也是消费增加的重要原因,上述三项因素构成了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传导机制。为持续推动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带动扩大内需,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县域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无障碍落户中的作用。目前,建制镇和中小城市落户已经全面放开,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仍然存在一定的落户限制。为此,需要健全农民工市民化机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市辖区的落户准入条件,健全农民工家庭在务工地稳定居住和获得与当地城市居民同等公共服务的政策保障机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增强其消费动力。

第二,缩小落户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资产差距既是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又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为此,一方面要注重提升农民工的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农民工进城就业能力,发挥收入增加在消费水平提高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发挥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作用,衔接落户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步增长机制,

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促进落户农民工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增进落户农民工的城市户籍身份认同带动家庭消费水平提升。

第三,重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降低农民工群体收入风险的保障机制。目前导致农民工群体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预防性储蓄较高。降低农民工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提升其消费动力。为此,可以适当提升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的比重,进一步稳定农民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的预期,加强政策支持和宣传力度,减少农民工家庭的预期不确定性。

[参 考 文 献]

- [1] Jin Z. F. & Zhang J., "Access to local citizenship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a hukou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51, No. 1 (2023), pp. 181-215.
- [2] 程郁、赵俊超、殷浩栋等:《分层次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解“愿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两难困境》,《管理世界》2022年第4期,第57-65,81页。
- [3] Tian Y., "Internation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reform: effects of WTO accession on Chinese internal migration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106, No. 3 (2024), pp. 794-813.
- [4] 张吉鹏、卢冲:《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4期,第1509-1530页。
- [5] Fang H., Li M. & Lin W.,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entrepreneur sorting,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https://cesi.econ.cuhk.edu.hk/wp-content/uploads/Wei-Lin_Labor-Market-Integration-Entrepreneur-Sorting-and-Regional-Inequality_Final_22_08.pdf, 2023-08-01.
- [6] 洪银兴、陈雯:《由城镇化转向新型城市化: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探索》,《经济研究》2023年第6期,第4-18页。
- [7] 苏红键:《中国县域城镇化的基础、趋势与推进思路》,《经济学家》2021年第5期,第110-119页。
- [8]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效应、方向和路径》,《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第4-14页。
- [9] 张顺莉、赵晓迪、朱俊峰等:《家庭化迁移到城市对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经济地理》2023年第10期,第160-169,189页。
- [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第4-16,41页。
- [11] Chen B. K., Lu M. & Zhong N. H., "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70 (2015), pp. 133-146.
- [12] 王乙杰、孙文凯:《户口改变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微观追踪数据的证据》,《劳动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第68-100页。
- [13] Wang J. H., Ai S. & Huang M., "Migration history, hukou status, and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conomic Modelling*, Vol. 97 (2021), pp. 437-448.
- [14] 晁钢令、万广圣:《农民工家庭生命周期变异及其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管理世界》2016年第11期,第96-109页。
- [15] 钱文荣、李宝值:《不确定性视角下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 679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11期,第57-71页。
- [16] Cheng Z. M., "Education an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127 (2021), pp. 206-215.
- [17] De Luca G., Lisi D. & Martorana M. et al., "Does higher institutional quality improve the appropriateness of healthcare provis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94 (202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7272720302206>.
- [18] Stark O., *The Migration of Labo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ress, 1991.
- [19]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1 (1969), pp. 138-148.

- [20] Taylor J. E.,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Vol. 4 (1986), pp. 147-171.
- [21] Kitchin R. & Thrift N.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Amsterdam: Elsevier, 2009.
- [22] Vinogradova A., "Legal and illegal immigrants: an analysis of optimal sav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27, No. 1 (2013), pp. 201-224.
- [23] Dostie B., Li J. & Card D. et al., "Employer policies and the immigrant-native earnings gap,"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233, No. 2 (2023), pp. 544-567.
- [24] Liao Y. & Zhang J. F., "Hukou status, housing tenure choice and wealth accumulation in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68 (202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43951X21000560>.
- [25] Cai S. & Zimmermann K. F., "Social identity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internal migrant work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163 (2024),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4292124000059>.
- [26] 王春超、孙曙涛:《社会认同与歧视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7期,第123-137页。
- [27] 王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6-16页。
- [28] 钱龙、卢海阳、钱文荣:《身份认同影响个体消费吗?——以农民工在城文娱消费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51-60,138页。
- [29] Xu B., Clark W. A. V. & Pak M., "Homophily, selection, and choice in segregation models," *PNAS*, Vol. 121, No. 7 (2024), <https://www.pnas.org/doi/epub/10.1073/pnas.2313752121>.
- [30] Akerlof G. A. & Kranton R. E.,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No. 3 (2000), pp. 715-753.
- [31] Oh S., "Does identity affect labor sup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3, No. 8 (2023), <https://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aer.20211826>.
- [32] 锁凌燕、陈晓宇、王正位等:《户籍制度、身份认同和风险承担——基于CHFS数据的分析》,《经济科学》2023年第4期,第178-202页。
- [33] Shen G. J. & Zhang C. C.,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32, No. 1 (2024), pp. 1-20.
- [34] Ahmed A. M., "Group identity, social distance and intergroup bia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 28, No. 3 (2007), pp. 324-337.
- [35] Li S. X., Wang S. Z. & Yang S., "What is in local dialects? a field experiment on social distance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job training,"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 106 (202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4804323000940>.
- [36] 汪鲸、罗楚亮:《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分析》,《财经研究》2023年第10期,第139-153页。
- [37] 郭冬梅、陈斌开、吴楠:《城乡融合的收入和福利效应研究——基于要素配置的视角》,《管理世界》2023年第11期,第22-46页。
- [38] 章莉、李实、Darity W. A., Jr. 等:《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户籍歧视》,《管理世界》2014年第11期,第35-46页。
- [39] Liu X. G., *China's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20.
- [40] Chen X. F., "Why do migrant households consume so little?"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9 (2018), pp. 197-209.
- [41] 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第21-32页。
- [42] Gai Q. G., Guo N. J. & Li B. J. et al., "Migration costs, sorting, an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ap," 2021-04-17, <https://www.economics.utoronto.ca/public/workingPapers/tecipa-693.pdf>, 2024-03-02.
- [43] 齐秀琳、汪心如:《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5期,第128-150页。
- [44] 孟凡强、彭志勇、陈亮均:《中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测度与差异分解》,《经济地理》2024年第2期,第

- 52-60页。
- [45] 尹志超、刘泰星、张诚:《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1期,第24-42页。
- [46] 沈坤荣、谢勇:《不确定性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2年第3期,第1-13页。
- [47] 尹志超、郭沛瑶:《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第64-83页。
- [48] 赵国超、虞晓芬、许璐媛:《“工者有其居”理念下农民工居住满意度研究——基于2020年浙江流动人口抽样数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第47-57页。
- [49] Wang J. S. H., Zhu Y. W. & Peng C. H. et al., “Internal migration policies in China: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policy design in 2014,”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58 (2024), pp. 457-478.
- [50] 孙文凯、赵忠、单爽等:《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构建与检验》,《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第1515-1536页。
- [51] 陈媛媛、邹月晴、宋扬:《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经济学(季刊)》2024年第1期,第119-135页。
- [52] Dustmann C., Fasani F. & Speciale B., “Illegal migratio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immigrant household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5, No. 3 (2017), pp. 654-691.
- [53] 张诚、翁希寅、尹志超:《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8期,第126-147页。
- [54] 易行健、周利、张浩:《城镇化为何没有推动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基于半城镇化率视角的解释》,《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8期,第119-130页。
- [55] Danzer A. M., Dietz B. & Gatskova K. et al., “Showing off to the new neighbors? incom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internal migran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2, No. 1 (2014), pp. 230-245.
- [56] Malmendier U. & Shen L. S., “Scarred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16, No. 1 (2024), pp. 322-355.

Micro-mechanisms of the Impact of County-level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ese Family Database

Guo Xiaolin¹ Chen Shuai² Zhao Zongyin² Qian Wenrong²

(1. Institute of Wester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Boosting the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migran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extensive literature shows that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hukou* registration system, rural-urban migrants do not have the expectation of living a long-term and stable life in the urban areas, thus lea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role of the migrants as consumers has not been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s also been affected to some extent. A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moting the settlement of migrants in counties and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ir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through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stabi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efforts. Based on the five rounds of the China Household Panel Survey from 2011 to 201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micro-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on their household consumption, using manually collected texts on the reform of the *hukou*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n openness index of *hukou* registr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as an instrument variable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main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Overall,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in count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and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among migrant households. Additionally, this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lso reflects a broader trend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within communities. However, consistent with the 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 this paper does not find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on the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the enhancement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the increase in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 reduction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uncertainty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the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These mechanisms illustrate how social identity and economic stability contribute to more substantial consumer behavior among migrants. This paper further verifies the distance effect in identity recogniti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migrant households increases more as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decreas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i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older migrants compared to the new generation, and in counties compared to urban districts, with more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households with smaller income and asset dispariti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sumption levels of Chinese migrant households. In the future, suppressing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within counties and enhancing identity recognition after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better connecting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with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To commit to improv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s after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nsify effort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hukou* system, especially in larger cities, to fully leverage the demand-driven role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in increas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come levels of migrants, especially wage income, and to mitigate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within counties to better leverage the role of income increase and reduced income disparities in boosting consumption. Finally,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reduce the uncertainties faced by migrant household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households that have undergone *hukou* registration conversion and activating the large consumption market. Moreover, enhancing community support and integrating migrant families into local networks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ultimately contributing to a more robust and inclusive domestic market.

Key words: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ousehold consumption; identity recognition

